

斯大林為甚麼支持朝鮮戰爭？ ——讀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 與朝鮮戰爭》

● 楊奎松

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最近在大陸公開的出版，終於使學界了解到中國學者從近年來解密的大量俄國檔案當中，對朝鮮戰爭起因找到甚麼樣的答案。朝鮮戰爭到底是怎樣爆發的？中國究竟為甚麼非要出兵不可？幾十年來，這始終是困擾着各國學者，甚至當政者的極大謎團。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一

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以下簡稱《戰爭》，以下凡有引文（包括以楷體標示者）而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此書，恕不一

一註明）一書，幾經周折，終於得以在大陸出版。這是一個讓學術界感到高興的好消息。朝鮮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當年曾親身參與戰爭醞釀過程的領導人都已去世。隨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當年主要的介入國，包括美國和俄國的檔案大多已解密。海外研究者對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發表了許多成果。大陸學者也早在幾年前就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是，他們的成果過去卻難以在大陸公開發表。沈志華是最早在這方面達成研究成果的學者之一，本書充分展現他收集和利用俄國檔案進行研究的能力。本書的出版，終於使關心這一歷史事件的學界同仁有機會了解到中國學者從近年來解密的大量俄國檔案當中，找到了甚麼樣的答案。

《戰爭》一書着重研究朝鮮戰爭爆發和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決策背後的蘇聯因素問題，特別試圖說明1950年2月中蘇締結同盟，對四個月後爆發的這場戰爭起了哪些作用，而隨着戰爭進程的逆轉，這場戰爭本身又對中蘇同盟提出了怎樣

的挑戰，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書雖然名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但它其實更多地談論朝鮮戰爭，特別是中國人所說的抗美援朝戰爭的起源問題，即金日成為甚麼要發動進攻，毛澤東又為甚麼非出兵不可？在這裏面，斯大林到底起過甚麼樣的作用，扮演了怎樣的角兒？他為甚麼支持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到底是怎樣爆發的？中國究竟為甚麼非要出兵不可？幾十年來，這始終是一個困擾着各國學者，甚至當政者的極大謎團。兩個主要當事國——中國和蘇聯，當年的大多數領導人對戰爭的起因，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鮮戰爭是在1950年6月爆發的，僅十年之後，即1960年6月，即使是曾經參與戰爭決策討論的親歷者，對戰爭爆發的原因和中國出兵的背景，就已經說不清楚了。1960年6月22日，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與中共代表團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正式會談，雙方在許多問題上互相指責，發動朝鮮戰爭的責任問題也被赫魯曉夫翻了出來用以指責毛澤東；可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對此完全否認，並且寸步不讓。

讓我們看看他們雙方當時圍繞着這個話題是怎麼爭吵的，各自的說法又是甚麼①：

赫魯曉夫：我們在這個小範圍裏，可以講，朝鮮戰爭是北朝鮮發動的，是蘇中兩國都同意了。

彭真：不對，我們沒有同意。我參加了政治局的討論，這個問題我是知道的。

赫魯曉夫：我們也看到了文件，毛澤東是同意了。

彭真：有兩點必須說明：一、發動朝鮮戰爭，我們事先不知道；二、戰爭打起之後，你們派大使找我們中央，說蘇聯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們來出兵。

赫魯曉夫：那個時候如果是我們這些人擔任領導，而不是斯大林的話，這場仗就打不起來了。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會那樣做的。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決定後才發動的。

彭真：你說的不對，毛澤東同志是反對打的。毛澤東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說過，如果戰爭打起來，那就不是南朝鮮的問題，而是美帝國主義的問題了。即不是南朝鮮能否拿到手的問題，而且是北朝鮮能否保住的問題。這樣的意見，毛澤東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談起過。朝鮮戰爭打起來以後，斯大林說，如果蘇聯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戰，因此才請中國出兵。因此我們才同意出兵的。我當時參加了政治局會議的討論。

赫魯曉夫：你說的是戰爭打起來以後的事，問題是發動戰爭斯大林和毛澤東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說的不是事實，是造謠。我參加了討論。我們始終認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最有發言權。

赫魯曉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歲數？

彭真：五十八歲。

赫魯曉夫：你比我年青，但是記憶力卻不如我。

彭真：我的記憶力很好，我記

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爆發，僅十年之後，即使是曾經參與戰爭決策討論的親歷者，對戰爭爆發的原因和中國出兵的背景，就已經說不清楚了。1960年6月，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與中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談時，赫魯曉夫就發動朝鮮戰爭的責任問題指責毛澤東；可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對此完全否認，並且寸步不讓。

赫魯曉夫堅持北朝鮮發動進攻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批准的；而彭真則堅信毛是不同意的。對此，《戰爭》一書清晰指出，就「六·二五」進攻而言，從最初的策劃，到最後的實施，都是由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推行，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參與其間。因此，赫魯曉夫提出這場戰爭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批准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得很清楚。因為政治局的討論，我是參加了的。我們把意見告訴了斯大林。

赫魯曉夫：事後諸葛亮，中國人就喜歡這樣。

彭真：不對，我們確實同斯大林說過。

赫魯曉夫：他是不聽別人意見的，他已經把自己變成了偶像。

彭真：我們對斯大林是不滿意的。我們有委屈……。

赫魯曉夫：(再說一遍)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兩個人共同決定的。

彭真：完全不對。毛澤東同志提了意見。這一點，你可以問問當時參加過討論的其他同志，那樣你就會明白了。

赫魯曉夫：我們不要談死人了。我說，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過錯。

彭真：根本不對。你們有人也參與了這件事，應該可以作證。我再一次聲明，你說的根本不對。

從當年中蘇兩國的內部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到雙方領導人都不迴避戰爭是因北朝鮮首先越過三八線這一行動而引發的事實。他們爭論的關鍵僅僅在於，到底是誰批准或者說決定發動這一進攻的。赫魯曉夫堅持這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批准或決定的；而彭真則堅信毛澤東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對的，強調中方對戰爭的發動事先並不知情。

對此，《戰爭》一書有相當清晰的回答：第一、具體就「六·二五」戰爭而言，從最初的策劃，到最後

的實施，都是在斯大林與金日成，即蘇聯和朝鮮之間秘密進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參與其間。因此，赫魯曉夫提出這場戰爭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澤東批准或由他們兩人共同決定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澤東並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計劃，斯大林也並非沒有就此與毛澤東通過氣。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訪問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戰爭一事來徵求毛澤東的意見的。在毛澤東託周恩來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Nikolai Roshchin)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實意圖時，斯大林也明白無誤地告訴毛澤東：儘管他已同意了朝鮮人關於實現統一的建議，但是，「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在斯大林已經同意了朝鮮人的計劃之後，毛澤東和他的同志也沒有反對。因此，赫魯曉夫「如果毛澤東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會那樣做的」的說法，也不是捕風捉影的。

有時候歷史就是這樣複雜。

二

斯大林為甚麼一面背着中國人與金日成策劃統一朝鮮的戰爭，一面卻又堅持金日成必須取得中國人的同意呢？十分明顯，這是因為斯大林不能不顧及到中蘇兩國在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據約定，締約國的任何一方進入戰爭狀態，另一方都應予以有效的援助。朝鮮戰爭雖

然並不一定直接導致蘇聯進入戰爭狀態，但是，蘇聯作為朝鮮戰爭的主要策劃者、支持者和武器供應商，不能不承擔可能的風險。何況，朝鮮戰爭的任何不測，都勢必給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國帶來極大的麻煩，斯大林當然不能自行其事，而把自己的同盟者中國人完全晾在一邊。

不過，人們通常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問題，那就是，為甚麼斯大林會批准在朝鮮採取這種連信奉「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毛澤東當時都認為有些過於冒險的行動呢？要弄清楚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根據《戰爭》一書所做的研究和描述，看一看蘇聯戰後在朝鮮問題上的態度是怎樣變化的。若果注意到這種變化，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斯大林最初並沒有在朝鮮向美國挑戰的意圖，僅僅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意外成功，再加上中蘇兩國的結盟，才導致斯大林改變他在東亞一向小心謹慎的戰略考慮。

根據《戰爭》一書的記述，1945年8月9日蘇軍大舉進入中國，並且迅速地橫掃中國東北，進入朝鮮半島。就在蘇軍受命進入朝鮮半島之際，杜魯門(Harry S. Truman)卻發來一通密電，告訴斯大林，美方主張美蘇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受降區域以三八線為界。對此，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應下來，而他的如意算盤僅僅在於：原屬日本的千島群島和日本本土北海道也都在三八線以北，因此他要求將這兩塊地方也交由蘇軍佔領。據此，斯大林一方面下令已經越過三八線的蘇軍撤回到三八線以北地區，另一方面命令蘇

軍全力進駐日本的北海道。沒想到美國人卻不想和斯大林交易。

由於資料的限制，《戰爭》一書沒有具體解釋斯大林為何白白丟了進佔南朝鮮的機會，卻未能進駐北海道，只是提到了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一句話，即：只要蘇軍有一兵一卒在北海道登陸，我就敢馬上扣押蘇聯駐日代表團全體人員。據說斯大林進駐北海道的計劃就這樣中途擱淺了。對照這個時候斯大林為控制東歐國家，不顧其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簽訂的「百分百協定」(“The Percentages Agreement”)②，強硬抵制英美勢力的所作所為，蘇聯在朝鮮問題上的反應似乎並不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為，即使斯大林不願因蘇軍登陸北海道與已經佔據日本島的美軍發生衝突，他也完全可以為了報復麥克阿瑟的狂妄，不顧美國單方面提出的三八線而一舉佔領整個朝鮮半島。畢竟這個時候蘇軍完全有條件搶在美軍前面給美國人一個難堪。

斯大林為甚麼會在歐洲和在亞洲表現得迥然兩樣？其實作者在書中其他地方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對於遙遠的遠東地區，她的方針過去是，這個時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勢。既然是保持守勢，依據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所提出的要求，蘇聯在東北亞問題上只滿足於取得對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和把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攬入囊中。對於朝鮮半島，斯大林沒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準備任由美、蘇、英、中四國託管後建立一個獨

二次大戰後，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對於遠東地區，她的方針是保持守勢。蘇聯在東北亞問題上只滿足於取得對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對於朝鮮半島，斯大林沒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準備任由美、蘇、英、中四國託管後建立一個獨立的朝鮮國政府，沒有像在東歐國家那樣全力扶植共產黨人。

立的朝鮮國政府。也正因為如此，蘇軍佔領北朝鮮之後，不僅大肆拆運朝鮮北方的工廠機械以充作戰利品，而且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裏任由民族主義者曹晚植擔任北朝鮮臨時權力機構的負責人，沒有像在東歐國家那樣全力扶植共產黨人。

斯大林開始全力扶植北朝鮮共產黨，與美蘇冷戰的發生有着明顯的因果聯繫。但是，正如《戰爭》一書所說明的那樣，直到1948年，美蘇在歐洲已經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而蘇聯在東北亞的政策依舊十分謹慎小心，因為他相信自己在遠東的力量完全無法與美國相抗衡。

斯大林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在朝鮮或朝鮮北方建立像東歐那樣的衛星國。因此，蘇聯首先呼籲美蘇軍隊同時撤出朝鮮半島，而後宣布蘇聯佔領軍主動撤出朝鮮北方，並承諾給予朝鮮人充分的自治權力，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承諾給一些東歐國家的自治權。斯大林甚至不願意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具有聯盟性質的外交關係，也不願意為他們統一祖國的事業承擔責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國。

三

戰後的斯大林不願意在亞洲刺激美國，這並不是甚麼新聞。至少，許多上年紀的人都知道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他不許毛澤東「革命」的情況；熟悉戰後中共歷史的人多少都聽說過當年八路軍趕在國民黨軍前面進入東北，卻被蘇聯紅軍趕出城市的故事。以至在不少

中共領袖的印象中，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還是因為害怕美國干預，而有過讓國共兩黨劃江而治的想法。既然如此，為甚麼到了1950年初他會突然改變態度，願意冒着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巨大風險來支持金日成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計劃呢？按照以往眾多學者的觀點，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關於美國太平洋的防禦範圍不包括朝鮮半島與台灣的说法，給了斯大林以錯誤的信息。《戰爭》一書對此提出了異議。

《戰爭》一書的解釋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轉變對朝鮮半島問題態度的關鍵，並不是美國領導人的講話，而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對此，書中是這樣說明的：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建立對於斯大林改變朝鮮半島和遠東政策所發生的作用，並不完全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蘇聯感到其在遠東的力量得到了加強，從而有了在朝鮮半島與美國勢力抗衡並戰而勝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政權的更迭和新的中蘇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從而才需要改變政策，以保證蘇聯戰後確定的遠東戰略目標繼續存在。對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禦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權益，另一面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

戰後的斯大林不願意在亞洲刺激美國，這並不是甚麼新聞。當年八路軍趕在國民黨軍前面進入東北，卻被蘇聯紅軍趕出城市。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還有過讓國共兩黨劃江而治的想法。但為甚麼1950年初他會突然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改變態度？在《戰爭》一書的作者看來，其關鍵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脅」。同樣，簽訂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固然加強了蘇聯在亞洲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1945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益。

蘇聯要失去甚麼重要的權益呢？據條約規定，「蘇聯在可以預見的短短兩三年內，將失去其通過《雅爾塔協定》(The Yalta Agreement)和舊中蘇條約獲得的」可以使蘇聯通向太平洋的中國的中長鐵路和旅順這個不凍港。

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仁川和釜山這兩個港口將代替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戰爭》一書強調斯大林的戰略考慮時，十分重視其沿襲沙皇俄國在遠東追求不凍港的歷史傳統，這種分析自有其邏輯性。無論在雅爾塔會議上，還是在出兵中國東北時，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諱地揚言，蘇聯對日作戰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權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

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順港。

不過，結合書中附錄，即作者補充的幾篇文章，可以看出上面的表述只是作者所強調的一個方面而已。隨着研究進一步深入，作者注意到事情遠比上述解釋複雜得多。顯而易見，如果斯大林害怕中國會很快強大，他為甚麼隨後會在蘇聯還遠未能從戰爭創傷中恢復過來的情況下，為中國派出那樣多的專家，提供那樣多的援助，以幫助貧弱落後的中國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呢^③？我們要知道，斯大林並沒有對東歐那些兄弟國家如此慷慨過。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願意放棄中長鐵路和旅順港，他也完全可以像他初次見面見毛澤東時那樣，說明廢除舊的中蘇條約可能對蘇聯帶來嚴重傷害，事實上毛澤東也知趣地接受了斯大林的這種解釋。這遠比發動一場危險的境外戰爭要容易得多。更何況最先提出蘇軍應該從旅順港撤兵的，也是斯大林，而非毛澤東。查一下1949年1月底米高揚(Anastas I. Mikoyan)在中國西柏坡與毛澤東談話的記錄，以及他與斯大林的來往電報，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中共領導人相信，蘇軍不應當過快地從旅順港撤走。甚至直到毛澤東會見斯大林時，他還在繼續提出這樣的請求。反倒是對1946年2月《雅爾塔協定》披露後中國各地爆發反蘇遊行示威情況印象深刻的斯大林，注意到中共取得政權後蘇聯若繼續駐軍旅順港，將會直接影響蘇聯乃至中共在輿論中的形象，因此一再主動表示願意撤軍。

蘇聯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她一旦成為世界性的大國，勢必想要獲得太平洋上的不凍港來作為海軍基地。《戰爭》一書強調斯大林沿襲沙皇俄國在遠東追求不凍港的歷史傳統。斯大林曾揚言，蘇聯對日作戰的目的，是要收回沙俄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權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旅順港。

由於蘇聯在歐洲受到美國的壓力太大了，斯大林要另找途徑來分散美國的力量。他過去在亞洲採取緩和政策，是因為他看不出有誰在亞洲能夠幫助他，擔心出現兩面作戰的危險。現在他敢於支持朝鮮戰爭，向美國挑戰，是因為他注意到新中國能夠幫助他在亞洲牽制美國，以減輕他在歐洲和中亞的壓力。

蘇聯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她一旦成為世界性的大國，勢必會千方百計地想要獲得太平洋上的不凍港來作為自由進出太平洋的海軍基地。即使在朝鮮戰爭之後，蘇聯在中國建長波電台、提議蘇中越三國建立聯合潛艇艦隊，乃至70年代從越南取得金蘭灣作海軍基地，在在都是要讓其海軍能夠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因此，我們確實不能忽略斯大林支持朝鮮戰爭的這一層用心。但這毫無疑問不是唯一原因，甚至恐怕不是主要原因。畢竟，用戰爭來獲得或保住一個出海口，這裏面的風險和代價無論如何都太大了。何況，斯大林一向謹慎小心，精於計算，他不會看不出，萬一戰爭失利，旅順港的軍事基地將會因為整個朝鮮半島完全落入美國人手中而變得毫無價值。而且，一旦美國人站到了圖門江口，蘇聯人怕是連自己的海參崴都會成為累贅，保住一個旅順港又能有多大意義？再者，即使戰爭打贏了，誰又能保證統一後的朝鮮一定願意租讓自己的不凍港？就算當時願意，誰能保證朝鮮人一定不會像中國人那樣有一天會想要收回自己的港口呢？

四

那麼，甚麼是促使斯大林在1950年敢於支持朝鮮戰爭的主要原因呢？結合《戰爭》一書及其所附文章提供的分析，我們還可以從當時斯大林的境遇來作更進一步的探討。自從他在柏林危機中被迫退讓

後，他明顯感覺到蘇聯還沒有力量與美國在歐洲公開對抗。正是由於蘇聯在歐洲，包括在中亞，受到美國的壓力太大了，他才會想到另找途徑來分散美國的力量。他過去在亞洲採取緩和政策，不惹麻煩，是因為他看不出有誰能夠在亞洲幫助他，擔心出現兩面作戰的危險。現在他敢於策動進攻，向美國挑戰，是因為他注意到中國革命成功了，新中國能夠幫助他在亞洲牽制美國，以減輕他在歐洲和中亞的壓力。他主動讓中共來承擔指導和援助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責任，積極幫助中國恢復經濟和建設工業，也都是為此。

其實，《戰爭》一書也注意到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關注和態度的變化。它沒有提到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德熱拉斯 (Milovan Djilas) 關於1948年2月斯大林主動就他不適當地干預了中國革命一事進行自我批評的那段重要回憶^④，但它具體地說明了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為了穩定亞洲局勢和保住其在東北的權益，如何寄希望於國共之間的妥協；1948年以後，他由於注意到中國革命有出乎意料的進展，又是如何不失時機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幫助我們的中國同志」來創建「新中國」的。

斯大林為甚麼會如此重視中國革命的勝利？第一，中國太大了，作為亞洲第一大國，她的勝利毫無疑問對太平洋對岸的美國構成巨大的打擊和不小的威脅；第二，中國的榜樣作用太誘人了，美國連中國這樣一個極具戰略價值，給予大量援助，並被視為盟友的國家也不敢

干預，它又怎會輕易干預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呢？如果多數亞洲國家都能像中國那樣揭竿而起，美國還有餘力來對付蘇聯嗎？

十分明顯，正是中國革命的勝利——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以及幾個月之後，即1950年2月中蘇兩國正式結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蘇聯與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力量對比，因而也明顯地改變了斯大林在遠東問題上一貫小心謹慎的態度。這當然不是說斯大林由此從守勢轉入了攻勢，斯大林是不會讓蘇聯冒這種風險的。但是，斯大林看起來相信可以通過中國並由中國出面去做一些讓美國人頭痛的事情。正因為如此，他才不僅不怕中國發展，反而希望幫助中國盡快發展起來，以便發揮她在亞洲的影響力，推動亞洲各國的革命，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幫助蘇聯有效地牽制美國。

這樣的說法有沒有甚麼具體的事實來支持呢？有。最直接的例證就是1949年7月劉少奇在莫斯科訪問時，斯大林明確提出兩黨分工，亞洲各國共產黨應由中國黨來指導和幫助。讓中國黨來指導幫助亞洲黨，說透了，也就是讓中國黨運用自己的成功經驗，推動亞洲其他各國的共產黨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這方面，斯大林顯得比中國黨還要熱心和着急。有兩個例子能夠充分反映這種情況：

一是1949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亞洲理事會的會議上，新中國的領導人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堅持必須向亞洲各國提出武裝鬥爭的方針。包括蘇聯代表團團長在內，各國理事對此一致表示

異議，因為他們都習慣於不做刺激美國及其所在國政府的事。然而，問題提到莫斯科之後，在斯大林的干預下，劉少奇的提案竟然得到鼓勵，其報告被認為「是正確的，及時的，建議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劉少奇的發言中有甚麼使世界工會聯合會執委會的同志們害怕呢？」據蘇聯駐華臨時代辦解釋稱^⑥：

使他們害怕的首先是，他（劉少奇）號召亞洲——印度支那國家、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等國的工人階級公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他指出，不同帝國主義及其傀儡——亞洲各國的政府進行武裝鬥爭，工人階級不僅不能滿足自己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反而會被帝國主義份子及其傀儡的優勢力量所粉碎。所以他號召亞洲國家的所有工會工作者團結在工人黨的周圍，建立人民解放軍或衷心支持這些國家已有的人民解放軍。

劉少奇對世界工會聯合會執委會起草的決議表示堅決反對，因為決議輕描淡寫，毫無分量，有意迴避亞洲國家工人群眾的最關鍵問題——同亞洲國家的帝國主義份子進行武裝鬥爭問題。

世界工會聯合會執委會的同志們，其中包括路易·塞揚，看過劉少奇的草案後，對他聲明說，如果通過這一草案，那我們就得趕緊收拾行裝，從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為通過類似決議之後，處在帝國主義國家領土上的世界工聯任何行動都將成為不可能。號召印度支那、緬甸和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反對帝

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斯大林明確提出兩黨分工，亞洲各國共產黨應由中國黨來指導和幫助。斯大林希望幫助中國發展，發揮她在亞洲的影響力，運用自己的成功經驗，推動亞洲其他各國的共產黨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幫助蘇聯有效地牽制美國。

斯大林並非僅僅是因為要與中國簽訂新約，旅順港幾年後可能要歸還，因而一夜之間變得激進起來。他的亞洲政策自1948年以來一直逐漸地趨向激進。1950年，他對朝鮮戰爭由否定到肯定的態度轉變，正是因為此時他徹底完成了方針性的轉變，即決定在整個亞洲推動攻勢防禦的路線。

國主義的武裝鬥爭，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倫敦和其他帝國主義的城市裏平安地住下去。

顯而易見，斯大林改變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中國黨的觀點。

二是斯大林在1950年1月突然開始不顧日本和印度兩國的具體情況，全面干預兩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1月6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受命公開發表〈關於日本的形勢〉的觀察員文章，批評日共某些領袖不僅沒有領導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佔領軍的鬥爭，而且鼓吹「即使國內有美國佔領軍，日本仍可能和平地直接走到社會主義」，麻痺日本人民的革命意志^⑥。日共領導人以日共政治局的名義發表文章，為自己的方針辯解，認為共產黨情報局沒有考慮到日本的具體情況。於是斯大林動員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情報局的觀點，批評日共領導人和平過渡的錯誤論調，強調共產黨「必須用革命的精神來教育人民」，「使人民一步一步革命化」，「向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以「結束美國佔領，結束反動統治」^⑦。

蘇中兩黨的共同干預，終於導致日本共產黨接受了情報局的意見，開始修改黨的政治路線和方針。黨的領導人紛紛轉入地下，黨的方針從主張「和平革命」轉到要開展武裝鬥爭，並且提出要建立以城市企業為根據地的城市游擊隊和以農村為根據地的山村工作隊，開展「自衛反擊戰爭」^⑧。

幾乎與此同時，情報局機關報於1月27日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編輯部文章〈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文章強調中國革命的經驗，聲稱^⑨：

民族解放鬥爭能夠獲得勝利的結果的一次決定性條件，就是在必要的內部條件允許的時候，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組織人民解放軍。中國、越南、馬來亞和其他國家的例子說明了武裝鬥爭現在正成為許多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形式。

該文並點明：

印度共產黨的任務，根據中國和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自然應該是加強工人階級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為實現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鬥爭，並在爭取自由與國家獨立、反對壓迫他們的英、美帝國主義、反對與英、美帝國主義者合作的反動大資產階級和封建王公而進行的共同鬥爭的基礎上，團結一切願保衛印度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階級、黨派和團體。

情報局的主張也促成印度共產黨改變政治路線。印共中央改組後，明確提出了走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

五

上面的情況清楚顯示，1950年的斯大林並非僅僅是在一個朝鮮問題上，即因為要與中國簽訂新約，旅順港幾年後可能要歸還，因而一

夜之間變得激進起來。事實上，斯大林的亞洲政策自1948年以來一直逐漸地趨向激進，從他這一年開始自我批評自己以往的態度，和採取措施加強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即可以看出來。但只是到1950年1月時，他才徹底完成了方針性的轉變，即決定在整個亞洲推動攻勢防禦的路線。斯大林對朝鮮戰爭由否定到肯定的態度轉變，正是這一方針轉變的一種表現。

為甚麼是在1950年1月，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後呢？在這一點上，《戰爭》一書所強調的無疑是對的，那就是因為斯大林決定了要與中國另訂新約。在此之前，儘管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非常看好，並且自1948年起即大力給予支持，但他始終還是小心翼翼地害怕惹惱美英兩國，因而不敢公開張揚。斯大林為甚麼在亞洲問題上那麼怕他們呢？一個關鍵原因，就是《雅爾塔協定》。斯大林在毛澤東抵達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對毛澤東解釋為甚麼蘇聯不好與中國另訂新約時，對此講得十分明白。

斯大林說：1945年與國民黨簽訂的那個中蘇條約，是依據《雅爾塔協定》來簽訂的。而蘇聯戰後得到的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都是依據《雅爾塔協定》得來的。如果廢除中蘇舊約，另訂新約，「哪怕改動一項，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藉口。」^⑩

而兩周之後，一直處在轉折關頭的斯大林到底把這件事想通了。

他在1950年1月1日晚，派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和米高揚拜見毛澤東，通知毛，他和聯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要與新中國另訂新約了，讓《雅爾塔協定》見鬼去吧。顯然，斯大林想借助中國的力量，就必須與毛澤東訂立盟約。如果他拘泥於《雅爾塔協定》，就無法把中國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盟友。事實上，同遵守那個已經被中國革命勝利弄得千瘡百孔的《雅爾塔協定》相比，斯大林與毛澤東簽約顯然對蘇聯更有益。因為從美蘇在歐洲的爭鬥可以清楚看出，冷戰在亞洲蔓延只是早晚的問題。沒有中國的幫助，蘇聯在亞洲將只能處於被動的局面。若要借助中國的力量來牽制美國，那就絕對不能太受《雅爾塔協定》的束縛。精明過人的斯大林，又怎麼會讓毛澤東快快地去，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設法把毛變成自己的盟友呢？

明顯地，正是因為受到與中國關係的利益的極大誘惑，和對中國及其經驗寄予極大期望，斯大林才會下如此大的決心，決定不再理會美英的反應，與中國另訂新約，結成盟友；也正是因為與中國結成了盟友，下決心要借助中國和中國的經驗推動亞洲革命，牽制美國，斯大林才會轉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亞洲各國的共產黨模仿中國，開展武裝革命；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革命的方法來統一朝鮮半島時，他才會一改以往的拒絕態度，毫不猶豫地答應金日成的請求。

《戰爭》一書對斯大林就金日成提議的表態是這樣說明的：

斯大林想借助中國的力量，就必須與毛澤東訂立盟約。如果他拘泥於《雅爾塔協定》，就無法把中國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盟友。與毛澤東簽約顯然對蘇聯更有益，因為從美蘇在歐洲的爭鬥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戰在亞洲蔓延只是早晚的問題。沒有中國的幫助，蘇聯在亞洲將只能處於被動的局面。

斯大林不把幫助金日成的情況透露給當時正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戰爭》一書提出三個原因：一、考慮到中國要求蘇聯援助解放台灣，很難說服毛同意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二、斯大林擔心局勢發生困難時毛會置身事外；三、斯大林暫時瞞着毛，最後還是會徵得毛的同意，因為他預防美國萬一千預的對策，是希望由中國軍隊直接抗衡美國的威脅。

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宴會上激動地對蘇聯大使館參贊談到，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後，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了。為了能夠實現朝鮮的統一，他最近幾乎夜不能寐。因為他上次訪問莫斯科時，曾經提到過這個問題，但斯大林告訴他要在李承晚的軍隊進攻北方時，再來對南朝鮮進行反擊。問題是李承晚一直沒有發動進攻，結果使得統一國家的事情被拖了下來。他需要再次會見斯大林，以便就人民軍解放南朝鮮的問題得到指示。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隨後按照聯共中央政治局原來的意見答覆了金日成，但出乎大使意料之外的是，斯大林得到他的電報後，反而於1月30日覆電表示願意幫助金日成實現計劃。

斯大林在電報裏說：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不難看出，1950年1月發生了太多的情況，而所有這些出人意料的情況，都源自於斯大林從思想上突破了《雅爾塔協定》的禁錮，下决心與中國結為盟友。既然如此，以後的所有步驟，推動日本、印度搞武裝革命，答應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其實都是斯大林開始在亞洲放開手腳後的接續動作。

六

既然斯大林決心進攻，他為甚麼不把他準備幫助金日成的情況透露給當時正在莫斯科準備與他簽訂同盟互助條約的毛澤東呢？

《戰爭》一書對此是這樣解釋的：

第一、「考慮到中國要求蘇聯援助解放台灣的同時，在莫斯科很難說服毛澤東同意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在與金日成最後商定之前，不能徵求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意見」；

第二、斯大林還有兩點擔心：「既擔心毛澤東在事前反對莫斯科的決定，又擔心局勢發生困難時毛澤東會置身事外，不聽從莫斯科的指揮」；

第三、斯大林瞞着毛澤東是暫時的，他最後還是會徵得毛澤東的同意的。因為斯大林必須預防美國萬一千預的問題。「斯大林的對策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希望中國出來承擔責任，即由中國軍隊直接面對美國的威脅並與之抗衡。」

筆者對第一點解釋是基本贊同的，對第二、三兩點則認為尚需有所補充。理由如下：

一是斯大林與劉少奇就中蘇兩黨的責任問題有過分工，中國黨管亞洲國家的共產黨，蘇聯管其他各洲國家的共產黨，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朝鮮黨基於被蘇軍佔領和管理多年的情況下，實際上仍由蘇聯黨負責。因此，就黨、政、軍、經實際的聯繫狀況，斯大林無須就朝鮮問題與中國黨具體磋商。

二是斯大林在與金日成正式磋

商和確定軍事行動方針之前，我們似乎還不好斷言他決定暫時不告訴毛澤東，一定是因為「他對毛澤東是缺乏信任的」。當毛澤東還在莫斯科時，他和金日成之間尚未有過任何具體的磋商和討論，進攻與否尚在未定之數，他這個時候不具體告訴毛澤東他的想法以及和金日成的計劃，並非不合情理。何況我們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兩人在莫斯科沒有就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具體地交換過看法。《戰爭》一書也兩度肯定兩人「可能討論過朝鮮局勢」，或「談到了朝鮮問題」，只是「具體內容不詳」。既然如此，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在朝鮮統一的解決方案問題上，沒有達成過一致的意見。事實上，在主張武力解決這一基本原則上，即使我們不了解他們談話的具體內容，也可以相當肯定地推斷出他們之間沒有分歧。說毛澤東會反對，至多也只是進攻的時機問題。這是因為，和斯大林的態度一樣，毛澤東也明確認為朝鮮統一問題必須通過解放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對於這一點，還在一年以前，他就對朝鮮人說得很明白。他甚至已經具體地提到了可能採取行動的時間：1950年初。他說：1949年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於這一點時，才可以採取。」^①事實上到1950年春天，毛澤東也準備好與金日成討論進攻計劃的問題了。3月底朝鮮大使李淵周與毛澤東商量金日成訪華的事情時，毛澤東就明確地提出：「如果已經有了統一朝鮮的具體計劃，那麼會晤就必須秘密進行。」^②

三是涉及到斯大林應該何時向毛澤東通報這一情況時，還應當考慮到保密問題。的確，正如《戰爭》一書所指出的，「朝鮮戰爭是中蘇結成同盟關係後第一次面臨最重大的國際問題，也是對這一同盟關係最重大的考驗」，再加上朝鮮和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地區邊界相連，斯大林沒有理由不向毛澤東通報他與金日成之間準備採取的這一重大軍事行動計劃。但問題是，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是一個非常謹慎且善用心計的人。不僅在事情還沒有商量出一個眉目之前，他不會輕易透露自己內心的打算，就是事情有了一些眉目，他還是會審時度勢，選擇向毛澤東通報的時機。應當說，當金日成去了莫斯科，斯大林與他敲定了要發動進攻之後，他就明確要求金日成去和毛澤東商量此事，並徵得同意，這在斯大林來說已經是冒了相當大的風險。

為甚麼這麼說？因為我們通過米高揚的回憶錄可以清楚看出，斯大林並非不相信毛澤東，但他卻不那麼相信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一定不會走漏風聲。米高揚講到，1949年1月斯大林正在與毛澤東通過電報密商如何應付南京政府要求蘇美英等國出面調解國共關係一事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突然搶先一步向南京政府宣布美國拒絕充當調解人，這在克里姆林宮裏引起了強烈反響。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一定是中共中央內部有人泄漏了斯大林與毛澤東通電的情況。斯大林還特別要求米高揚向毛澤東轉達他對中共保密工作的高度關切。儘管毛澤東明確告訴米高揚絕不存在泄露他與斯大林電報內容的

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和毛澤東商量統一朝鮮的問題，這在斯大林來說已經冒了相當大的風險。因為斯大林並不那麼相信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一定不會走漏風聲。更何況，他這時還收到中共領導層存在嚴重親美傾向的相關報告。或許，斯大林並沒有刻意隱瞞毛；相反，他反倒是為了不使毛感到不快，預先向中方通報這一重大機密。

有學者相信斯大林是早就計劃以朝鮮戰爭來挑撥中美關係。然而，我們在文獻和史料中找不出斯大林當年曾提到美國人可能出兵干涉的任何憑據。如同《戰爭》一書所說，當這場進攻開始後，美軍大舉介入令莫斯科和平壤感到非常意外。由此看來，關於斯大林用朝鮮戰爭離間中美關係的說法，實在很值得商榷。

可能性，米高揚卻並不那麼相信毛的說法^③。更何況，斯大林這時還收到其私人代表科瓦廖夫 (Ivan V. Kovalev) 反映中共領導層情況複雜，當中存在着嚴重親美傾向的相關報告^④。注意到這些情況，我們或許有理由認為，斯大林並沒有刻意隱瞞毛澤東。相反，在他看來，他反倒是為了不使毛澤東感到不快和被動，多少有點冒險地預先向中方通報了朝鮮戰爭這一重大的軍事行動機密。

四是研究者通常容易為了解釋的合理性而把歷史上一些工於心計的領導人想像成深謀遠慮，運籌帷幄，好像凡事都早有預謀或陰險的設計，但有時候這卻未必符合事實。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其實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促成；許多歷史人物遠沒有我們今天想像得那樣詭計多端或遠見卓識。說斯大林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準備好了萬一美國出兵干預，就讓中國出來承擔責任，直接與美國抗衡，可能多少有點把斯大林神化了。因為這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作者同意那種關於說斯大林支持朝鮮戰爭是設計好了要以此來離間中美關係和把中國拖入戰爭的。而這恰恰並非作者的觀點。因為作者在書中講得很明白，斯大林在戰爭爆發前及其在戰爭計劃過程中，其實很少認真考慮美國可能進行直接干預的問題。

美國自1945年9月到1949年6月一直駐兵南朝鮮。到戰爭爆發時，仍舊在南朝鮮留駐美軍顧問團，幫助指導和訓練軍隊。就一般邏輯而言，北朝鮮發動進攻，南朝鮮一旦出現危機，以美國政府在歐洲和中東地區處處與蘇聯對抗的那種心態，當然可能出兵干預。斯大林在

最初設想朝鮮戰爭的進程時，理當考慮到美軍干涉的可能。因此，的確有學者相信斯大林是早就計劃以朝鮮戰爭來挑撥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且希望當美軍出動時把中國人送到朝鮮去與美國人抗衡。

然而，歷史有時就是那樣吊詭。因為，正如《戰爭》一書所呈現出來的情況那樣，遍查文獻和史料，我們都找不出斯大林當年曾經提到美國人可能出兵干涉的任何憑據。金日成甚至明確講過，斯大林認為美國人不會干預。從蘇聯將軍幫助制定的那個速戰速決的北朝鮮進攻計劃，以及今天可以看到的蘇聯和朝鮮之間交換的戰前的各種情報和進行各種部署的相關文件當中，我們都看不到斯大林和朝鮮方面對美國可能的干預做過任何必要的準備。如果說斯大林曾經考慮到美國干預的問題，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這也恰恰可以說明，為甚麼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去見毛澤東之前會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不準備向中國要求任何援助。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才可以解釋，何以當這場進攻開始後，美軍大舉介入的行動，如同《戰爭》一書所說，令莫斯科和平壤都感到非常意外。斯大林甚至不知道朝鮮方面打算繼續向前推進還是決定暫停前進，他們會不會被美軍的空襲嚇壞了？而朝鮮人民軍的推進計劃也確實受到影響，部隊佔領漢城後一度停止不前。而為了繼續組織進攻，人民軍竟然在開戰一周多後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臨時將指揮系統全面改組^⑤。了解到這些情況，那種關於斯大林刻意想用朝鮮戰爭來離間中美關係的說法，實在很值得商榷。

七

斯大林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不那麼英明，毛澤東又怎麼樣呢？就已有的史料來看，至少在談到外國可能干涉的問題上，毛澤東想的似乎要比斯大林多一些。當然，他談的也主要是日本，而非美國。《戰爭》一書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相關談話。他在1949年4月底接見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時曾明確講過：美國人走了，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並拖下去，「日本就可能捲進來」。而美國人走，日本人也沒有來，如果北方對南方發動進攻，日本也可能捲進來，因為「麥克阿瑟能夠迅速把日本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來」^⑥。在1950年3月底與李淵周的談話中，他甚至提出：「對於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⑦

目前所知的毛澤東唯一提到美軍有可能干涉的談話，是在1950年5月15日毛澤東與金日成具體討論北朝鮮計劃的過程之中。毛澤東首先還是詢問日本人捲入戰爭的可能性。對此，金日成回答說：日本人不可能參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國派遣兩至三萬名日本軍隊的可能。日本軍隊的參戰對戰爭進程不會有決定性影響。如果日本軍隊參戰，人民軍將會更加勇猛地戰鬥。毛澤東表示，從目前的情形看，日本確實沒有參戰的可能。但如果有兩至三萬名日本軍隊參戰，戰爭就有可能長期化。接着，毛澤東話題一轉，提出：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他說：因為蘇聯

與美國之間有關於三八線劃分的協議，不便參加戰鬥，但中國沒有這種義務，可以幫助朝鮮。金日成對此表示了婉拒，他認為，美國人不可能干預。但毛澤東仍舊表示，如果朝鮮在中國佔領台灣後再開始對南方作戰，中國就可以給朝鮮充分的幫助。而朝鮮既然已經決定現在就開始作戰，作戰是兩國的共同任務，所以中國也同意，並將提供必要的援助^⑧。

「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毛澤東這樣說，也準備這樣去做。但從中共黨內來看，毛澤東的這一承諾，也曾經引起了相當的質疑和不安。《戰爭》一書所提到周恩來在1950年7月2日與蘇聯大使的談話內容，就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共領導人對朝鮮人不顧美國可能干預而堅持發動進攻，有頗多不滿。注意到8月初，人民軍推近釜山對馬海峽沿岸一帶，只剩下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硬是攻不下美軍防線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明顯洋溢着一種躍躍欲試的情緒。毛澤東明確講過，我們準備用志願軍的形式幫助朝鮮。周恩來更雄心勃勃地說：「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後，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但是，等到10月初整個戰事因美軍在仁川登陸而逆轉，人民軍主力陷於全軍覆滅的險境，美韓軍隊可能迅速跨過三八線向北推進，中共中央領導人中絕大多數都明顯對毛澤東的出兵主張持保留態度了。

《戰爭》一書對於中國參戰決策過程中態度上一次次變化的解釋和前後經過的描述，不僅到位、合

斯大林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不那麼英明，毛澤東又怎麼樣呢？在談到外國可能干涉的問題上，毛澤東想的似乎要比斯大林多一些。1950年5月15日毛與金日成討論北朝鮮的計劃時，毛提出萬一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他說：因為蘇聯與美國之間有關於三八線劃分的協議，不便參加戰鬥，但中國沒有這種義務。

理，而且相當生動、具體。作者將所掌握到的大量俄國檔案與中方的文獻及其當事人的回憶相互比照參考，將整個過程寫得細緻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勝。作者雖然是研究蘇聯史的專家，相比全書寫斯大林及金日成的其他部分，他對中國領導人當時決策背景和心態的辯證把握，卻似乎更顯其所長。由此看來，中國人寫中國人，到底要比寫外國人更容易一些。但這種情況卻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儘管目前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已經被披露得相當多了，我們要深入到作為當年朝鮮戰爭最主要推動者的斯大林的內心世界裏去，了解其切實的想法和設計，弄清楚他究竟在哪些問題上失算及其原因，還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註釋

- ① 〈赫魯曉夫與中國黨代表團談話紀錄〉(1960年6月22日)。
- ② 根據1944年10月簽訂的這份協定，蘇聯不能對東歐各國推行一黨統治，英美勢力應在這些國家中佔有大小不同的比例。
- ③ 關於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即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的情況，在註②沈志華書所附論文中，有詳盡的介紹。
- ④ 南共領導人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和《鐵托傳》(Tito)的英文作者杰吉耶爾(Vladimir Dedijer)都具體地談到過斯大林在1948年2月的這段談話。
- ⑤ 〈謝巴耶夫關於亞洲國家工會和婦女大會事宜與劉少奇的會談備忘錄〉(1949年12月25日)。沈志華提供的中蘇關係檔案，編號SD09847。

⑥ 轉見《人民日報》，1950年1月11日，一版。

⑦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

⑧⑨ 孫耀文：《共產黨情報局——一個特殊的國際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17；318-20。

⑩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紀錄〉(1949年12月16日)，《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5期。

⑪⑫⑬⑭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90；336；1187，190；381。

⑮ 關於這一點可以從米高揚(Anastas I. Mikoyan)後來發現他秘密訪問西柏坡一事外界長期無人了解感到異常驚訝的情況，即可想見。列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編著，李玉貞譯：〈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1949年1-2月)〉，《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

⑯ Ivan V. Kovalev, "The Stalin-Mao Dialogue", interview by Sergei N. Goncharov, *Far Eastern Affairs*, nos. 1-2 (1992).

⑰ 見〈史達林關於朝鮮戰局的指示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7月1日)、〈什特科夫關於朝鮮人民軍整編問題致史達林電〉(1950年7月4日)，收入註⑫《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頁424、427-28。

⑱ 〈金日成南侵陰謀〉，《朝鮮日報》，1993年7月28日；韓國外交部：〈六·二五真相——俄羅斯政府公開的韓國戰爭的秘密文件〉(1994年11月)。

楊奎松 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